

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

——上海市场变化研究报告

张继光 曹之虎 张道根 主编

51

复旦大学出版社

序 言

《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运行》，是一本系统探讨市场变化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关系的创新性著作。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经济运行的机制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市场的变动同国民经济运行的关联，也越来越紧密了。不仅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会极大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总量增长、结构变动，而且市场机制的引入已引起国民经济运行流程和传导方式的重大变化，以及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动，也决定和影响着市场形势和格局的变动。市场变动同国民经济总体关联的强化，使得市场形势变化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显示器。市场供求总量的紧张驱拉国民经济超速增长，市场疲软则拖累国民经济增长的步伐，甚至导致经济衰退；市场供求结构和比价结构等变化则诱拉国民经济中生产结构的调整和资源要素重组。近年来我国加工工业超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加工工业受市场机制牵动和调节的强度大于基础设施部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中这种新情况，实际决策部门和企业界已有深切的直感，但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却过于零散和浅近，理论研究的滞后使决策部门、企业界面对市场形势表象变动，感到难以把握，结果往往被动地跟随市场，宏观决策者、生产者、消费者都极易产生过头的决策反应，国民经济近年来的骤热和骤冷正是这种被动过头决策的必然结果。实践呼唤理论研究的深化，要求理论界对市场变化同国民经济运行机制、流程等变动给予透彻、深入的理论解析。张继光、曹之虎、张道根主编的这本《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正是尝试对此问题作出较为系统解析的专著。这本书以实证材料和现象描述为基础，把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相结合，较为全面地阐

明和揭示了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运行的关联机制和变化程式。

《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选题新，研究角度独特。近年来分别研究市场机制、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国民经济宏观、微观运行的论著日渐丰富。但是，把市场变动同国民经济总体变动结合起来，进行相关分析的却极鲜见。尽管研究市场机制理论和宏观、微观经济运行的著作也都或多或少涉及一些两者关联性分析，但一般多过于抽象和简单。该书则以市场和国民经济动态关联为主线，从市场表象、变动过程、传导机理和国民经济运行表象、变动过程和宏观、微观机制的多层面相对应的全方位角度展开分析，因而更为系统和深刻。

《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较好地把握实证材料运用和抽象理论解析结合起来，从市场表象形态入手，层层深入，勾勒出同现实市场变化更加贴近的理论模型。该书在理论描述和概念创新方面的所为皆力图以实证材料和现象描述为基础，内涵较为实在。例如，该书概括出我国40年消费品市场波动的两种不同类型，即循环波动和增长波动，是以长期变化的实证材料为基础和不同经济体制下经济流程差异分析为背景作出的。再如，关于不同种类市场（消费品市场、投资品市场和中间产品市场）之间的传导关联以及它们同国民经济总量、结构的相关变动的理论描述和机制解析，创新颇多，但并无脱离实际经济运行之感。此外，书中对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和概括，也具有独创性，认为90年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其总量增长程式、结构演进速率、方向和体制改革的层次都具有不同于80年代的特征。尽管这一论断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该书作者在论证此观点方面是以实证材料和经验现象的动态演变为依据的，因此有相当的说服力。

《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是一本资料相当丰富的著

作。材料是分析、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理论研究中不注重材料的唯理化倾向是一大缺陷，本书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这一缺陷。通观该书，各章节的统计资料都较为丰富，不仅有时间序列资料，还有横断面资料，这就为动态的全面分析奠定了基础。据我所知，该书的作者们对实际材料的搜集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不仅搜集了大量史料，而且还对近年来上海市场的变动，尤其是消费品市场的变动，进行了跟踪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注重调查研究之学风，是很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当然，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书以上海市场变动和经济运行变动为模本，虽然有利于资料搜集和细致深入地分析，但放大到整个国民经济系统，就难免出现一些偏差，理论概括中可能有些不同。本书各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还体现得不够明显，分析和研究中的某些中间环节似存在疏漏和缺乏逻辑关联。尽管如此，我认为，本书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市场分析和国民经济运行研究结合分析方面质量较高的一本专著，也是填补我国理论界研究薄弱环节的新作。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理论界对此方面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决策部门、企业界等更好地把握市场动向。是为序。

李鸿江

一九九〇年十月于上海

目 录

总 报 告

消费品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1)

分报告之一

上海市场历史和结构变动的考察……………(40)

分报告之二

上海日用工业品市场变动的成因和趋势……………(66)

分报告之三

上海生产资料运行市场运行性分析……………(88)

分报告之四

上海农副产品市场变动及其对策……………(110)

分报告之五

上海进出口贸易与消费品市场变动相关分析……………(121)

分报告之六

价格变动与市场运行相关性分析……………(145)

分报告之七

收入分配与消费品市场相关性分析……………(174)

分报告之八

上海工业消费品市场变动与工业结构转换的相关特
征研究……………(194)

分报告之九

上海资金状况的历史和结构变动的考察……………(214)

分报告之十

调整商品结构、拓宽流通渠道、缓解市场疲软……………(233)

分报告之十一

发挥大店优势、扩大经营成果、缓解市场疲软……(243)

后 记……………(249)

总报告

消费品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

1. 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和国民经济流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变动尤其是消费品市场的变动已成为影响和牵扯国民经济总体变动的重要因素。这突出表现在1989年消费品市场的戏剧性变化，使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消费品市场变动究竟是怎样引致国民经济形势骤变？消费品市场变动的机理和成因是什么？其走势和趋向如何？以及面对消费品市场的重大变动，我们面临怎样的选择，这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

2. 上海的消费品市场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市场，上海消费品市场的变化往往是全国的先兆，从上海消费品市场的变化入手，展开深入的分析，有助于清晰地把握市场变动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关系，本报告以上海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变动为模本，从国民经济总体角度研究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变化、机理、成因、趋势，讨论工业消费品市场变动同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关联。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近年来消费品市场变动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影响；第二部分分析消费品市场变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第三部分研究消费品市场变动格局的深层成

因；第四部分提出我们对消费品市场走势的判断和若干对策建议。

第一部分 消费品市场变动是国民经济 总体运行的重要变量

3.从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深层透析，工业消费品市场变动是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和收入流程变化的外在重要反映。反过来，消费品市场的变动又会对国民经济总体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伴随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推进和国民经济机制的变化，国民经济流程变化的枢纽已由积累导向中心转入消费导向中心。国民经济运行流程和机制的变化更多受到市场消费需求的影响和拉动。消费品市场的变动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变动的先导。特别是消费品市场的突然过热和骤然转疲，更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短期变动和长期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变量。我们从国民经济运行主要宏观指标和诸经济参数的变动关系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4.从宏观指标考察，对上海消费品市场变化同工业总产值变化的历史材料的动态分析可以看出，工业消费品市场变化同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变化具有相关性。1979年之前，这种相关性的决定性变量是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变动，而在1979年以来，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变动逐渐成为决定性变量。（见图1）

图1显示：（1）从1957—1979年，上海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变化幅度大于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的变化幅度，在时序上，当工业总产值处于上升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处于上升阶段，反之则反是。但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变化滞后于工业总产值的变动，当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已到峰顶转入下降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还未及峰顶而继续上升。如1958年是工业总产值增长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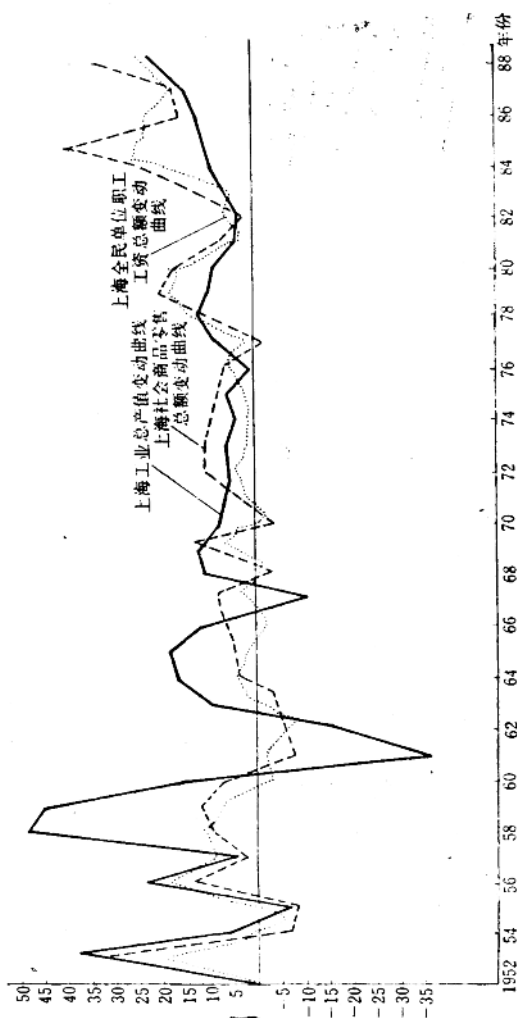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全民单位职工工资总额动态趋势曲线

该周期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顶峰却在1959年。1965年为工业总产值增长的第2个顶峰，而该周期中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顶峰却在1966年。这表明，在1957—1979年期间，工业消费品市场的变动完全从属于工业总产值的变动，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完全从属于国家以工业增长为中心的积累目标，经济运行受中央直接计划的单元协调。

(2) 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的变动同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变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同1979年之前相比，1979年之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的变动幅度大于工业总产值增产的变动幅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变动成为更为活跃的因素了。从时序上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变动同工业总产值的变动的时间轨迹极其趋近。当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变动处于最高峰值的时候，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也处于最高峰值上，当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跌至谷底时，工业总产值的增长也落入谷底，两者在时间上完全重合。^①可见，1979年以来，上海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变动极大地受到本地工业消费品市场行情的影响和牵动。上海工业生产的变化逐步溢出传统的单纯中央计划机制的渠道，而受到最直接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变动的工业消费品市场的约束和导向。

5. 消费品市场变动同国民收入波动也存在着对应关系。1952年以来，上海消费品零售总额动态曲线显示其周期性特点，与此相应，国民收入增长动态曲线也大致相似。不过，1979年之前和1979年之后，两者的关联则呈显不同特点。（见图2）

(1) 1979年之前，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变动的幅度大大小于国民收入增长波动的幅度，消费品流通的波动增长周期的时间跨度略大于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时间跨度，其扩张或收

^①1978—1982年尚属改革之初和经济调整时期，因而两者变动尚未吻合，属特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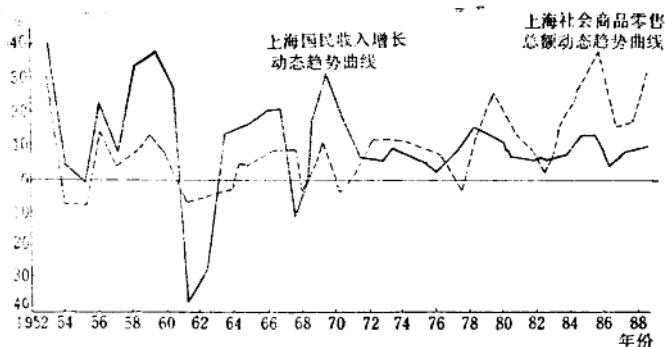


图2 上海国民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动态、趋势曲线

缩均晚于国民收入波动性扩张或收缩1—2年，其波峰和波谷均呈滞后状态。国民收入的巨大波动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平稳波动，说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十分明显。

(2) 197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消费品市场波动的幅度较之以前呈扩大态势，其扩张速度或收缩速度突然加快，消费品市场波动同国民收入波动轨迹、幅度、趋向更加接近，且消费品市场波动超前于国民收入波动。它表明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变动成为国民经济变动的先导，同国民经济运行的相关性大大提高。

6. 消费品价格、居民收入、居民储蓄等经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联，是消费品市场变动是否能牵动宏观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实证分析表明，1979年以后，上述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机制逐渐生成和发展。（见图3）

从图3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 从物价变动同工资收入和市场变动关系看，收入→需求→价格关联机制已经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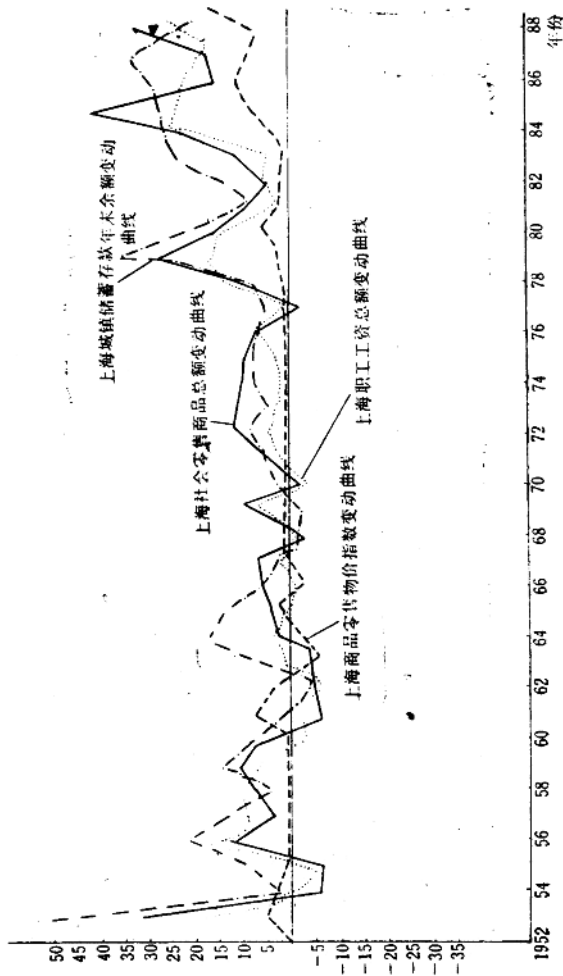


图3 上海零售物价总指数、居民收入和储蓄动态趋势曲线

1979年之前(起始点为195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同职工工资总额变动的相关度极低,二者几乎处于零相关状态。1979年之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与职工工资总额水平变动明显地呈现出正相关态。同时,二者波动的最低点均迅速提高,从未出现过负增长的情形。这同1979年之前,社会消费品物价总水平同职工工资总额的波动多次出现负增长,形成较大反差。

1979年前后社会消费品物价总水平与职工工资总额水平变动截然不同的特点表明,1979年之前,社会消费品市场的变化完全不受作为市场需求主体的收入水平决定,有支付能力的货币需求的变化既不会影响价格,也不会影响供给。消费品价格的增长及其波动高度依赖于财政投资的变化。社会消费品供给和价格几乎完全由政府的计划和行政管制调节,1979年之后,伴随市场机制的引入,职工工资的增长变动以至整个居民收入的变动同经济增长以及总供给、总需求变动的相关性逐步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对消费品生产和价格的中央集中行政控制大大削弱。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变动及由此决定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变动对消费品市场价格及供给变动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供给、价格之间的耦合关联机制逐步形成。

(2)从消费品市场价格同居民收入、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三者之间变动关系看,收入→价格→储蓄→消费关联机制日趋强化。

1979年之前,我国消费的价格基本上长期冻结,1953—1960年期间,零售物价指数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1960—1970年,零售物价指数在+7%和-9%之间波动,并渐趋收敛于0点。以后一直处于静止状态,直到1979年之后,零售物价指数呈波浪式上升态势。与此相应,1979年之前,国家统一定价的价格长期冻

结阶段，居民收入、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的变化同价格因素无关。居民储蓄变化主要受居民的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变化决定。当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处于周期性的上下4次波动状态时（1960—1970年），居民储蓄额的变动只经历一个波动周期，居民消费额的变动经历2个周期，消费品市场变动同居民储蓄、居民收入等变量之间不存在函数关系。

1979年之后，消费品市场变动同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之间的耦合关联度大大提高。从统计分析看，1979—1980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升7个百分点，居民储蓄下降15个百分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10个百分点。1984—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17%，尽管居民收入比上年增长18%，但居民储蓄几乎没有增长。1987—1988年，物价指数上升23%，尽管居民收入增长27%，但居民储蓄下降15个百分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上升1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1979年以后，消费品市场价格上升必然伴随居民储蓄总额的下降，在居民收入增长时，消费品市场价格上升会伴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反之，在居民收入不变或增长缓慢时，会同时伴随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下降。当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下落时，情况则相反。如1985—1989年，零售物价指数涨幅下降10%，尽管同期居民收入降低近25个百分点，但储蓄却增长4%。1988—1989年，物价指数涨幅回落了4%，尽管收入降低近10%，但储蓄反增长15%多。显然，物价跌落时，居民收入即便降低，居民储蓄却会提高。物价跌幅越大，居民储蓄率提高幅度越大。同样，1979年后物价变动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变动也相关甚密起来。而在1979年之前，二者毫无关联。不过，同居民储蓄变动相反，物价指数变动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相当于居民消费）变动是正相关的，且后者的升降幅度高于前者。根据我们研究自1984年起，物价每上升1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就提高

2%，物价每回落10%，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就下降1.5%左右。

7. 上述实证分析显示，消费品市场价格，供给和需求之间以及消费品市场变化同国民经济运行中其他经济变量(如工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居民收入、居民储蓄等)之间，从1979年之前的几乎不存在耦合关联，到1979年之后，相互依存，彼此作用关系的出现，表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已开始转换，即市场机制逐步成为宏观经济机制的内在组成部分，经济运行中各经济变量通过市场机制这一水平渠道开始相互沟通，彼此影响，由国家调节(包括直接、间接)的经济变量同市场的经济变量开始互为函数。特别是消费品市场作为迄今为止发展最快的市场，已经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发生导向作用，成为牵动宏观经济形势的主要环节：

(1) 1979年以来，工业生产增长主要受消费品市场变动的拉动，特别是1984年以来，上海工业生产增长路线完全受消费品市场变化所左右。1984年以来，工业生产波动曲线同社会消费的零售物价指数变动曲线几乎完全重合，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曲线的升降完全一致。消费品市场的价格和需求变动通过拉动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变动，引致所有工业部门生产的同向变动。

(2) 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逐渐成为拉动价格结构、产业结构变动的最关键因素。消费品市场需求结构变化首先拉动消费的供给结构快速变动，并通过前后关联拉动整个产业结构变化。如对“老四件”的购买从1980—1982年洪峰期陡然跌到1983年低谷，使许多厂家迅速改变产品结构，转向需求看好的“新六件”(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冰箱、电风扇、照相机)的生产。受此拉动，前后项产业部门的生产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动。引致国民经济结构的重大改变。

(3) 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变动已成为国民经济运行中最受关注的变量。消费品市场的冷热变化直接牵动国民经济总体的

冷热变动。不仅消费品的价格、居民消费明显受消费的市场变化影响，投资品的供求和价格、政府财政收入等也受消费品市场冷热变动的影响。

第二部分 消费品市场变动： 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8. 消费品市场变动同国民经济总体运行耦合关联的强化，暗含着国民经济运行流程和运行机制的转换。那么，消费品市场变动作为国民经济运行变动的先导，它的自身运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约束，其变动的过程、机理如何，规则和趋向怎样？看来，弄清这些问题可能是解开主要经济问题症结和把握今后宏观经济运行趋向的关键因素。

分析研究消费品市场变动过程、机理等，必须从时间演变的历史跨度进行系统探讨，从而探明消费品市场变动过程和机制转换的历史拐点，进而正确判定消费品市场走势，透析其深层成因。

9. 对上海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历史演变的统计分析表明，上海消费品流通变动成周期性波动状态。自1951—1989年的38年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经历了10次周期性波动，即1951—1953年，1953—1956年，1956—1959年，1959—1967年，1967—1969年，1969—1972年，1972—1979年，1979—1985年，1985—1988年，1988年以后（参见表3）。从这10次波动的自身特征来看，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1956年之前的两个周期。其特点是波动的幅度很大，1951—1953年周期中最高点为40%，最低为-8%，落差为48%，1953—1956年周期中，以下降波幅度看，最高点40%，

最低点-8%，落差为48%；以上升波幅度看，最高点为13%，最低点为-8%，落差为21%。波动的长度为2—3年。

(2) 第二阶段是1956—1979年期间。此间经历了5次周期波动。其中波动幅度最大的1959—1967年的周期中，以上升波计算，最高点为7%，最低点为-9%，落差为16%；以下降波计算，则最高点为12%，最低点为-9%，落差为21%（由于下降波主要受3年大跃进影响，故为特例）。各次周期长度极不规则，最长的2次分别是8年（1959—1967年）和7年（1972—1979年），最短的2年（1967—1969年）。平均长度为4.6年。同第一阶段相比，第2阶段周期的波动幅度远远小于第一阶段中的周期波动，但周期平均长度却大大超过第一阶段周期波动。

(3) 第三阶段是1979年至今。此间经历的3次周期，除1988年开始的周期尚处于下降期而未完结外，1979—1985年的周期中，以上升波计算，最高点为38%，最低点为2.5%，落差为35.5%，以下降波计算则最高点和最低点分别为24%和2.5%，落差为21.5%。1985—1988年周期中，以上升波计算，最高点为32.5%，最低点为13%，落差为19.5%；以下降波计算则为38%和13%，落差为25%。2次周期的长度分别为6年和3年，平均长度为4年。同第一、第二阶段周期波动相比，第三阶段的周期波动的波幅大大小于第一阶段，但却远远大于第2阶段，周期平均长度则比第一阶段长1.5年而比第二阶段短0.5年。这说明，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同1956—1979年期间相比显得异常活跃而有序，同1956年以前相比则显得波动振荡更小，运行更为稳定。从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波动曲线中我们还可看到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波动的另一显著特征。1979年以来消费品市场周期波动的最低点水平远高于1979年以前，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上移。而在此之前的两个阶段中，周期波动的最低点均为负增长，且基本上落在相同的